

「陳上岷 主編」

楊守敬研究學術論文選集

楊守敬七十五歲小象圖



=52

崇文書局

鄭子勉

PDG

1<8>5.89=32
C 564



「陈上岷 主编」

楊守敬研究學術論文選集

八十九岁陈上岷题



崇文书



20019328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守敬研究学术论文选集/陈上岷主编. —武汉:

崇文书局, 2003

ISBN7-5403-0614-9

I. 杨 II. 陈 III. 杨守敬 (1839—1915) —

人物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K85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10576 号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武昌黄鹄路 75 号 430077)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92 号 430015)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1—2100 册

ISBN 7-5403-0614-9/Z·40

定 价: 20.00 元

杨守敬研究学术论文选集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孙志刚	杨斌庆	谢承仁	邓剑秋
副主任	孙 方	李 泉	文成国	胡文昌
	雷万春	戴浩书	陈 放	杨祖武
	马万程	别必雄		
委 员	符利民	贾庆生	贾兆凡	闫继才
	郝志群	李友明	冯万林	张国伟
	周存明	蒋正雄	邓正统	王长镜
	吴 洋	周振林	杨世灿	
主 编	陈上岷			
副主编	杨祖武	杨世灿		

目 录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研究发掘

无形资源(代序)	孙志刚 (1)
杨守敬与《水经注疏》	谢承仁 (4)
杨守敬《水经注疏》稿本辨伪	杨世灿 (14)
杨守敬清江巴祖溯源	杨世灿 (21)
杨守敬对三峡文化的疏证	杨世灿 (28)
杨守敬的书法与书学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陈上岷 (40)
杨守敬与日本书学研究	[日] 杉村邦彦 (50)
杨守敬书学思想及其治学精神	陈方既 (63)
简论杨守敬的书学思想	刘继昌 (89)
论杨守敬书学思想及其影响	王倚平 (98)
略论杨守敬书法渊源	虞逸夫 (104)
杨守敬的学术修养与书法艺术	钟鸣天 (108)
杨守敬《评碑记》、《评帖记》中之书学	
审美理念初探	刘 莹 (118)
杨守敬书法中的书卷气	段奇洲 (146)
双重突破——杨守敬书学的历史定位及	
现实意义	陈龙海 (151)

试论汉字书法的社会功能

——兼谈杨守敬书学成就以及他与日本书坛的

- 传统友谊 王国忠 (161)
- 杨守敬书艺述略 王晓钟 王倚平 (174)
- 关于杨守敬遗著及其书法 陈上岷 (180)
- 从《楷法溯源》的编选看杨守敬书学思想与
- 治学精神 杨祖武 杨俊红 (189)
- 杨守敬书法与《匡喆颂》 谷有荃 (199)
- 《寰宇贞石图》浅说 徐无闻 (206)
- 杨守敬书《何君墓志铭》的启示 祝大斌 (214)
- 论杨守敬书《宜都记》的艺术特色 赵 平 (223)
- 杨守敬以金石碑史探微 邹华清 (227)
- 从《雪柯日记》中出现的有关记述看杨守敬与
- 松田雪柯、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之间的
- 交流 [日] 杉村邦彦 (237)
- 关于杨守敬访日时中国公使馆迁移的
- 考证 [日] 青山碧云 (276)
- 杨守敬与岩谷一六之笔谈 穆 毅 (279)
- 杨守敬对刻书事业的贡献 康亦樵 (296)
- 杨守敬藏书中的和刻本汉籍及其
- 价值 郝志群 陈建堂 (302)
- 附录 (313)
- 题词 (313)
- 祝辞 (315)
- 后记 (327)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研究发掘无形资源

(代序)

孙志刚

刚过“五一”，时值初夏，致力于“杨学”研究的学人从四面八方莅临宜昌，出席杨守敬学术交流会。群贤荟萃，为宜昌平添祥瑞，专家云集，使长江三峡的清风格外爽人身心。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宜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宜昌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屈原和促进民族团结、千古流芳的王昭君。杨守敬先生是继前贤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名垂青史的宜昌籍文化名人。这里，我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诗词名句，表达宜昌人民对杨守敬先生的景仰之情：“伊古迄今，学者千百”，“亘古如生，永怀贤哲”。杨守敬先生是我国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1839年出生于宜都，1915年逝世于北京。他集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于一身，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为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卓著，闻名中外。他和弟子、枝江人熊会贞先生共同完成的150万言宏篇巨著《水经注疏》，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水利、农业、考古、文学、民俗等多种学科，“其境界开辟古今之所未有”，被誉为“旷世绝学”，成为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的里程碑。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

神，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国家至上的爱国精神，受到中外学者的推崇，更是他的故乡人民、后学子弟的楷模。

这次规模空前的杨守敬学术交流会，是经中宣部、省委宣传部批示同意，由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市政协、市委宣传部、省书画研究会、杨守敬学术研究会、杨守敬纪念陈列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省老领导李夫全、省政协副主席杨斌庆专程到会祝贺；省委宣传部、省老领导李尔重发了贺信。有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台湾台中师范学院和日本京都教育大学等中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专家学者的 30 多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谢承仁、郝志群、刘莹、陈上岷、钟鸣天、杨祖武、杨世灿、陈龙海等代表，着重从杨守敬与《水经注疏》、杨守敬对三峡文化的疏证、杨守敬藏书中的和刻本汉籍及其价值、杨守敬的书法与书学在日本的影响、杨守敬书学思想及治学精神、杨守敬的学术修养、杨守敬以金石碑史以及《评碑记》、《评帖记》中之书学审美理念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所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杨守敬学术研究、弘扬杨守敬精神、光大杨守敬业绩，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批无形的文化资源和财富，同时又是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宜昌山川秀丽，三峡文化底蕴丰厚。近代，文化建树略晚于杨守敬先生的，有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教育家张继熙。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出了声名远播的工人诗人黄声笑、农民诗人习久兰、工人作家鄢国培、农民故事家刘德培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同步发展，宜昌有以《土里巴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连续五届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我们有信心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将历史悠久的宜昌、将这座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开放城市，在新世纪建设成为世界水电、文化名城。

宜昌是三峡工程的所在地，作为世界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和

我国西部开发中线的起点，宜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千载难逢的机遇，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经济发展的亮点和湖北重要的增长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宜昌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全国一流的旅游名城，长江沿线重要的经济强市，是我们在 21 世纪之初的奋斗目标。绘就这一宏伟蓝图，关键在于深度推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加快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步伐。我们热切期盼今天与会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作宜昌发展的依托和后盾，期望以这次杨守敬学术交流会为契机，互相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进一步密切联系与合作，以加快宜昌的发展进程，为宜昌在新的世纪实现新的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此，我祝各位专家学者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常来宜昌！

（此文系原宜昌市委书记，现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孙志刚同志于 2001 年 5 月 12 日在杨守敬学术交流会上的致辞）

杨守敬与《水经注疏》

谢承仁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1839—1915年），集书法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舆地学家诸种学术头衔于一身，湖北省宜都县人（今宜都市）。家中少有田地，开一小纸店，因人口多，境况不甚富裕。守敬幼年丧父，由祖父教抚成长。少时聪颖，好学，深受老师喜爱。二十三岁中举。此后多次赴京会试，皆不售。中年，曾随驻日钦使黎庶昌去日本，与日本知识、文化界名士交往频繁，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卓越贡献。辛亥革命前，杨氏寓居武昌。武昌首义爆发，乱兵入宅骚扰，杨氏避逃上海。日人寺西秀武出面请求革命军政府保护杨家，都督黎元洪下令粘贴告示于杨宅门首，其辞云：

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杨氏一生埋头学术，从事著述；学识“淹通宏博”，著作等身。杨氏著作，大部分由他生前自己付刻问世，另一部分在他死后由其后代及学生代为付梓，尚有一部分则以稿本或抄件形式散落各处。杨著总数有多少，建国前有人统计过，但不确。《杨守敬集》整理小组成立，曾先后派人到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图书馆、资料室进行摸底调查，并委托留学生及外国友人在美、日两

国某些著名图书馆也进行过调查，统计杨著总数为83种，经研究，计划付印40种（部数统计办法及选用付印原则，见《杨守敬集·总序》）。《杨守敬集》共13册，第1册于1988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单独出版，其余12册于1997年6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及湖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集名，革命老人李一氓题，老人已于1990年去世。今13册共收书、文45种，其中第13册所收《影写隶古定尚书商书残卷》系杨氏收藏之书，《清客笔话》乃日本学者森立之与杨氏会晤时之笔谈记录，皆非杨氏本人著作，系作为附录收入。第8册所收《藏书绝句》，虽经宁可教授考证“应该不是杨守敬所作”，但语气甚斟酌，且有“应为同人一时之作”一语，“同人”亦包括杨氏在内，故此《绝句》仍收入集中。因在整理《杨集》过程中，陆续有杨著抄件、稿本发现，故最终出书总数45种与原计划印书数40种有所出入。

杨守敬是地理学专家，其代表作为《水经注疏》（以下简称《注疏》）。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论述全国水道之名著，历代研究此《注》者甚多，尤以明、清两代为最，称为“郧学”。两代名家辈出。在明有孙潜、杨慎、谢耳伯、黄省曾、吴琯、朱谋玮等人，在清有顾炎武、顾祖禹、胡东樵、阎百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等人。其对后世产生影响之郧学著作有：朱谋玮《水经注笺》、赵一清《水经注释》（别有《水经注笺刊误》）、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戴震参校官修武英殿本《水经注》，以及王先谦《合校水经注》。这些书虽对郧学研究有极大贡献，惟其成就仅限于郧《注》版本校勘，《经》、《注》辨正以及字句纠谬等“笺”、“校”、“释”、“补”、“刊误”诸方面，至于能为郧《注》内容作疏解、考订、正误者，则未之见。清初至道光间，刘继庄、沈钦韩、毕秋帆等人，虽都有为郧《注》作疏之打算，但均未成为现实。直到杨守敬之《注疏》出，方将郧学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学者罗振玉将杨氏地理学

之成就，与王念孙、段玉裁之小学及李善兰之算学，并称为清代“三绝”。北京大学教授袁同礼亦称颂杨氏“开舆地学之新纪元”。

《注疏》何时开始撰写？情况如何？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以下简称《杂忆》）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线索。《杂忆》载：“杨守敬立意作疏，以为郿氏之《注》，本于《禹贡》、《班志》，乃撰《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其源。以《经》作于魏人，乃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其世。以《隋志》魏近，《隋志》可证郿《注》，乃撰《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其委。又以历代州郡沿革，分合靡常，水道经流，古今悬绝，乃撰《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皆与《郿疏》同时纂辑，然后按图作疏，纤细差违，靡得而遁焉。”

这段叙述，材料来源乃刘禹生门人李以祉所提供，李经常往来杨氏家中，与熊会贞友善，熊为杨之得力助手、门生，并参修《水经注疏》，杨氏著述情况，李闻之于熊，然后转告其师，故所言可信。

《杂忆》虽未明说《注疏》撰写之年，但所叙事实已暗示出寻求答案之方法。既然撰写《注疏》须先“溯源”、“究委”，同时对其他相关地理书籍进行考证，并绘制相关地图，那么，如果能将这些“考证”、“绘制”时间查明白，不就可间接推知《注疏》撰著之年？

查《邻苏老人年谱》，得知：

咸丰八年（1858年），杨守敬开始对舆地图发生浓厚兴趣。

光绪二年（1876年），杨氏与饶敦秩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光绪三年（1877年），荆州知府倪豹臣延聘杨为“编纂员”，续修《荆州府志》。

光绪四年（1878年），杨聘请枝江熊会贞（闇芝）为西席，授其三子杨必昌读。熊亦以杨为师，称门人，并协助杨师撰修

《水经注疏》。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杨、熊共同起草《隋书地理志考证》。

如上所述,是否可把《注疏》开始之年定为光绪二年?或光绪三年?此并非绝无道理。依《杂忆》之说,绘制地图与起草《注疏》“同时”,定光绪二年为《注疏》起草之年、或预备起草之年,未尝不可。《荆州府志》包括有《荆州水道考》一篇文章,文中屡屡提及《禹贡》、《水经注》,说明这时杨氏已对《水经注》进行过研究,故定光绪三年为《注疏》起草之年,亦未尝不可。

或曰:绘制《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系受饶之“招”,纂修《荆州府志》系受倪之“聘”,皆非以杨氏为主,杨系处于撰修被动地位,虽有为郢《注》作疏之心,焉能有时间全力赴之?故定光绪二年、或三年为《注疏》起草之年,尚觉证据不足。

然而,定《注疏》起草之年为光绪四年,是否合适?答曰:合适。因这年熊会贞始为杨家西席,一面教书一面协助杨守敬整理、起草有关文稿,并实际担负了《水经注疏》“参疏”工作。光绪十二年,师生二人共同起草《隋书地理志考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信致崑芝,囑其来省襄校及起草为各地理书。自是以后,崑芝每年来省赞助。刻《汉书地理志补校》及《晦明轩稿》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水经注图》成,刻《水经注疏要删》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禹贡本义》及重订《历代沿革险要图》、《春秋地图》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刻《三国郡县表补正》及《三国地图》成。总之,这些成就的取得,莫不渗透杨、熊师生二人共同辛勤汗水。民国二年(1913年),杨守敬寓居上海,据熊会贞讲:“先生仍督会贞覆按《水经注疏》,昕夕不辍。”民国三年(1914年),杨氏任北洋政府参政。入京,“将沪上图书次第运京,会贞亦于十二月来京相依。”民国四年(1915年)1月9日,杨守敬逝世。熊会贞继承其师未竟之业,继续复校、修改、定稿《注疏》。

1934年2月21日，熊会贞致其友人郑德坤信中称：“《注疏》稿辱承缮注，草创已就，惟尚须修改，方敢问世。”1936年5月25日，熊会贞去世。自1878年至1936年，纂疏杨守敬、参疏熊会贞，师生二人精诚合作、呕心沥血，完成《水经注疏》这一空前巨著，经历时间五十八年——将及六十年。据此，以光绪四年（1878年）——熊会贞为杨家西席之年，定为《注疏》开笔之年，于情于理，当无不合。所谓“将及六十年”者，系将撰绘《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及纂修《荆州府志》这两年时间一并计入在内也。

1957年2月，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水经注疏》四十卷、附原稿之一（残卷）。

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四十卷。

据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水经注疏》钞本，当系日本学者森鹿三于1934年4月派人从熊会贞处抄录之副本。此钞本陈桥驿教授1983年访日时见过。

以上三种《水经注疏》本之相互关系，特别是北京、台湾两种影印本之质量比较，我在《重印〈水经注疏〉前言》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录。

1989年6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

1997年出版之《杨守敬集》，第3册、第4册所收标点整理之《水经注疏》，系以北京影印本为底本，参校台湾影印本及全、赵、戴、王诸本。

今若欲全面科学论说《水经注疏》学术上成就，实非易事。据统计，杨氏为郦《注》作疏，参阅书籍多达764种；1997年新出《水经注疏》，收入《杨守敬集》，16开本共2499页。即使粗略通读全书一遍，亦非经年累月不济，仓卒月旦，未有不“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者。虽然如此，但我既愧为《杨守敬集》主编，又直接参与《注疏》整理，不有所言，亦难以交代，故仅就一己管窥蠡测之见，陈说一二。

归纳言之，《注疏》之贡献，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订正郾《注》本身之讹误；疏通《经》、《注》隐晦难明之处；明示郾《注》所引故事、典籍之来源、出处及异说。另一方面，评断先儒、前贤学说之是与非；论评、褒贬后世各家“郾学”若朱、全、赵、戴等人研究成果之正误、得失；提出自己独特之见。上述方面有关例证，《注疏》中比比皆是，一时难以数计。除此之外，杨、熊师生之合作精神与研究精神，均为后世留下了学习的榜样。其研究精神，分而言之，约略有三：

第一，执着、负责精神。

杨守敬做学问，始终贯串着一种“执着”、“负责”精神，其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正得力于此。所谓“执着”，意谓牢牢把握，甚而含有痴迷之义；但非指固执己见，而是指对研究材料的把握与对研究对象的痴迷。所谓“负责”，认真待之意，对学问负责，对真理负责，对后代学人负责。用他的学生熊会贞的话讲：先生“嗜古成癖，书籍、碑版、钱、印、砖瓦之属，莫不多方搜求，储藏之富，当世罕匹”（见《邻苏老人年谱》，后引文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书）。杨氏不是古董收藏家，他收集古书、文物是为了做学问；正因为他有这种“嗜古成癖”之好，所以才使他掌握了大量丰富的书籍史料和文物史料，以供其旁征博引、证古论今；杨氏并非自视清高之无礼抗上者，而是以事实为重、真理为贵，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毫不假借”精神，所以才能使他做到不为势力之学所压倒，不为权贵之论所折服，而敢于提出自己高明独特之见。《水经注疏》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师生两代努力将及六十年方完成，这是何等艰巨的工程，若非具有强烈“执着”精神，焉能一贯到底！宣统元年（1909年），杨

氏已年逾古稀，此时居上海，据熊会贞讲：“先生因《水经注疏》虽已成书，尚待校定，须参考各书，嘱家人归取稿，并将所藏图籍一切运沪。稿至日，发篋与会贞详核，每一卷成，犹恐有误。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订，或通宵不寐。”这段话生动地再现了杨氏之执着、负责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值得后学深思、效仿。

第二，勇于求实态度。

杨守敬故乡宜都有一条清江，古称夷水。《水经》云：“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郦《注》云：“夷水，即假山清江也。”历来对这段《经》、《注》，有不同解释。一种认为夷水源出“蛮中”山区，不出于江；一种认为夷水“首受江”，而入于江，故谓之“江沱”。清初学者胡渭（字朏明，号东樵）则认为夷水首出鱼复江，尾入宜都江，是亦荆州之“沱”；并称古时由巴入楚，为避三峡之险，皆不经三峡，而由此路；后不知何时，夷水受江处日就湮塞，方取道三峡。且举《禹贡·导山》之文、《史记》张仪说楚王之言及其他史料为证。并讥评班氏《汉书》不言夷水“首受江”之疏略。杨守敬对此，不仅一一引证史实予以反驳，而且还进行实地勘察以求其实。下面就是他亲自勘察后所写的一段文字：

“余尝由清江，上溯至长阳之资邱，舟行止此。其间滩险以数十百计，两岸山峡壁立处，较巫峡又狭数倍。由资邱以上则崎岖更甚。其水有悬崖数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通舟。若古时，又有江水并流，势必漫山溢谷，非惟险逾三峡，将沙渠假山之间无居民矣。今按大江夔巫南岸之水，惟巫山之观渡河，与建始之蒲潭溪相近，而中隔大石岭，观渡北流，蒲溪南下，安能逾岭相通？观渡之上有大溪河，由驷塘入江，源出十二关，与建始之龙溪亦相近。而关岭重叠，亦断无通理。胡氏（胡渭——引者）悍然此说者，以郦《注》于‘夷水’有‘捍关’，与张仪说相符，

不知此‘捍关’特在江之南岸，近夷水，故郦于《江水篇》中亦载之。所谓‘临江据水’者，临大江据夷水也。以今准之，当近野三关，非必江由此溢出，且张仪云‘浮舟至捍关’以下，纵不由三峡，岂不可以出陆路？乃以上附《禹贡》，下议班氏，谬矣。”（见《水经注疏·夷水》）

上引文字，目的在于说明杨守敬的勇于求实态度。试想，为了弄清古代夷水是否其如胡渭所说，有所谓“受江之处”，竟不惜忍受翻山越岭之劳、甘冒疾流险滩覆舟灭顶之危，而从事实地调查，这是何等令人惊叹之勇气！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勇于求实态度，所以才使得杨氏能在他学术研究道路上走着一步一步坚实自信的步伐，取得一个一个扎扎实实成果。

第三，明确学以致用目标。

自古真正学问，莫不来源于实际，而又莫不服务于实际。《禹贡》、《水经》以及历代史书之“河渠志”、“沟洫志”，莫不如是。《水经注疏》之写成，得力于古代文献实际、考古实际，以及亲身调查实际，当然亦当服务于当代之现实。《水经注疏》撰著目的，表面上是为郦《注》作疏，为后世积累资源，实质上则是为当世提供有益经验教训，向有心治理河道水利者献计献策。或问：何以见得？曰：此点可从杨氏所写《湖北江汉水利议》一文中，得到肯定回答。

《湖北江汉水利议》原为抄件，藏重庆市图书馆，上无写作年月；建国前，曾发表于湖北师范学院《史地从刊》，此次整理重印，收入《杨守敬集》第5册。该文明显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以“唯高明裁之”句结尾，后一部分以“又有一大利者”句开头。

两部分文字，不仅写作时间不同，写作地点也不同。后一部分，因文中有“惟当日筑武泰闸时，守敬在黄州，未曾以此策上张香帅”数语及“别详《禹贡本义》”一语，故其写作地点、时